

ZHIDUBIANQIANYUZHONGGUOJINGJIWENTI

制度变迁 与中国经济问题

肖力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ZHIDUBIANQIANYUZHONGGUOJINGJINTI

制度变迁 与中国经济问题

肖力 著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问题

肖 力 著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9.125

字数：227 千字

插页：4

版次：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8.00 元

书号：ISBN 7-216-03476-7/F·627

前 言

—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老子)

治理一个大的国家，如同烹煮一条小鱼一样，最好不要搅来搅去，否则就会把国家搞得一团糟。用顺应自然的制度(道)来统治国家，捣乱者(鬼)就成不了气候。

老子在两千年前以如此智慧，寥寥数语把济世经国之道讲得如此透彻，可算是历史上最早的政治经济学家，至今无出其右者。

当然，有一点老子没有点明，这种无为而治的方略，只适用于太平盛世；当制度出了毛病，人民生活每况愈下时，“无为而治”就不灵了。这就需要制度变革。中国的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二十多年的改革，使中国的经济有很大的增长，既为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空前的机遇，也同时向我们提出了挑战。

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有没有“中国经济学”？这似乎是有争议的。有人曾说，在“文化学”学者眼里我们与洋人毫无共同之处，而在“经济学”学者眼里我们与洋人毫无区别。这表明一定的学科是有它一定的先验规定性的。经济学在西方人的分类中属于“社会科学”而不属于“人文科学”，它讲究逻辑与抽象，喜谈规律、机制、模型与数据。而这些规律等等作为“科学”范畴具有“给定条件下的普适性”，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经济学是无国界的，不可能有“中国

经济学”，如同没有“中国价值规律”或“中国式市场机制”一样。

所谓“给定条件下的普适性”，意味着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给定了那些条件，命题就能成立。正如物理学中的自由落体公式一样；只要该落体是“自由”的，它就满足这一公式，而不管这落体产自哪国。但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在自然科学中“给定条件”可以用受控实验方法设置，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中的给定条件只能由历史来赋予，不能人为设置。人们只能根据特定历史背景（亦即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所说的制度环境）所给定的条件去研究问题，并以此推进这门“科学”的发展。因此不难理解：尽管“市场机制”这类东西作为一种经济过程的逻辑，并不与英国的“国民性”相关，但以市场经济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却是在近代英国发展起来的。

从“人们只能根据特定背景所给定的条件去研究问题”这一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学”是应当有的，其作用决非“别人的经济学”所能取代。而当前中国“给定条件”的实质在于：她的经济正处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这应当说是世界性现象）过渡类型，而且是从计划经济出发开始这种过渡的（这也是所有转轨国家的共同现象），尤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进行过渡的——而这正是“给定条件”下最重要的问题。回避这一问题而谈论经济学的中国化，甚至希望在谈论“别人的问题”的基础上使“中国经济学”领先于世界，未免太不着边际，太异想天开了。这正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缘由。

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在经济发展史上，制度变迁能否成功或者说制度变迁走什么样的道路，取决于两个因素的共同制约：一是复杂的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二是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带来的“报酬递增”。在前一个因素的制约下，制度变迁不可能完全按照初始阶段设计的方向演进，往往一个偶然事件就会改变制度变迁的方向。就后一种因素而言，当“报酬递增”普遍产生时，制度变迁就能得到支持和巩固，而且在这

个基础上一环扣一环,沿着良性循环的轨迹发展。当“报酬递增”不能普遍产生时,制度变迁就朝着无效的方向发展,就会在痛苦的深渊里越陷越深。

令人欣慰的是,社会主义正是这样一种“报酬递增”的制度模式,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润滑转轨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意识形态。正如诺斯所说“当个人深信一个制度是非正义的时候,为试图改变这种制度结构,他们有可能忽略这种对个人利益的斤斤计较。当个人深信习俗、规则和法律是正当的时候,他们也会服从于它们。变迁与稳定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理论,并以此来解释新古典理论的个人主义理性计算所产生的这些偏差”。这种意识形态的更深层次作用,则在于它有利于降低经济制度转换的交易费用,从而也有利于制度或产权结构的进步。在界定和执行产权的过程中,如果各方面都只是从本身利益出发,就会遇到种种困难和阻力,这会使政府因成本过高而放弃改进产权结构的努力。但是,当一种意识形态使人们认识到政府的行为是正当和合法的,服从的阻力就会大大减少,也就减少了提供新的产权结构安排的费用。诺斯指出:“通过政治和司法程序进行资源配置为意识形态决定决策过程提供了大量的契机。近年来研究表明,立法投票行为的最佳预言者不是哪个主要利益集团,而是美国民主行动联盟和其他批评系统所持的意识形态观念。”在诺斯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这也正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天然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缘由所在。

二

在这样的“给定条件”下,伴随着中国制度变迁的逐步深入,“中国经济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一次真正的经济学革命,它至少包括八个方面的转变:

从主要做概念、范畴和基本原理的分析转向具体的经济发展、

改革思路和相应的政策措施的研究;从主要做“应该是什么”的理想化纯逻辑性分析转向正视国情特色、地区特性、行业特点的“可能是什么、只能是什么”的实证分析;从主要是引经据典,在“语录”中寻找真理的分析转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研究;从主要做政策的注解转向为政策、决策提供依据;从就事论事转向既重“这一个”,又重其他方面的综合的分析;从追求单一的“最优”理想目标的研究转向从实际出发考虑特定环境制约“较优”目标的研究;从舍我其谁、唯我正确的排挤性研究转向相互借鉴的兼容性研究;从主要做抽象的质的分析转入借助现代经济科学方法和科学工具做相关数据测算和量的分析。“中国经济学”逐渐走向真实、科学、精细与成熟。

作为这种成熟的表现,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我们逐渐学会了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可以归结为五个命题:(1)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2)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3)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4)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5)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与目的的统一。这五个命题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上述第一个命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首要原则。而其他四个命题,则是这个首要原则在经济分析进程中合乎逻辑的展开。这种方法论体系和分析框架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要根据新的“给定条件”加以适当调整,就可以直接运用于对今天我们面对的实际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只要我们在研究工作中认真把握和运用这个方法论,我们就能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发展实践做出新的理论概括,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不断获得与其辩证法的(即在自我扬弃中发展)本性相适应的现代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仍然可以、而且也无可替代地成为我们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理论基础选择。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由于是以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其资源配置方式背后所体现的生产关系与我国并不一致,而且其构建理论体系的前提性条件与我国的现实经济状况也有很大差异,使我们更加不能够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应用性或对策性的经济研究中的理论基础选择。

但是,市场经济具有共性的一面,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中反映资源配置一般规律的理论 and 相对成熟的分析方法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在纷繁复杂的西方经济思想中,一个主要线索,是西方的人文哲学。经济学说最初本来是由哲学家思考的,而哲学家思考经济问题,总是从人的本性这样的一般性规律入手。人有欲望,需要满足,于是驱使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早期的哲学家就是这样看待经济行为为动机的。虽然在西方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下,欲望被认为是一种罪恶,但其中的某些牧师,仍然坚持人的欲望并非罪恶,而且,也不能全然抑制;这一思想,到中世纪后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大胆的世俗思想家,公然提出“享乐主义”,把幸福与欲望的满足联系起来,并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思想,最后发展形成系统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哲学:人的本性就是欲望的满足,欲望则是由物品或效用来满足的,一份财富代表一份幸福。所以,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学不过是追求最大投资利益的“经济人”自发行为的综合;在马歇尔那里,经济学不过是追求个人最大效用的“有血有肉”的人“消费选择”的综合。诚然,凯恩斯有所保留,但他同样认为,如果不让人们发财,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就会窒息,所不同的只是他主张“发小财”。不管西方经济学存在多大的分歧,都是由人的本性是追求自身幸福或欲望的满足这一根本点出发的。从这一点看,西方经济学说可分为两大流派:完全以个人欲望满足为依归,分析经济问题、建立体系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个人欲望某种程度上服从社会利益、社会需要的所谓国家干预经济的学

说。后者的哲学根源大体出于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虽然人性总体上被认为是追求自身利益,但同时存在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绝对命令”,即社会的总体意志、道德意志。这一哲学思想与东方传统有某种程度的吻合。

另一条线索是价值论。我们知道,经济学存在两种价值论,即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什么是价值?价值由什么决定?如何增加价值和分配价值?等等,回答这些问题,就回答了经济学的大部分难题。劳动价值论比较古老,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配第、马克思,再到斯拉法,都是从劳动价值论入手,分析经济现象。这一学说的特点是从物质生产领域开始思考问题,并把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当作理解所有经济问题的关键。它必然得出资本剥削劳动、资本主义非正义公平的结论。效用价值论同样也很古老,古代思想家在是劳动创造价值还是效用决定价值问题上从来就含糊不清。但它的正式形成尚在马克思主义之后,大体上是以与劳动价值论相对立的面貌出现的。效用是一个包含广泛的概念,包括物的效用和服务的效用。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体系自然成了一个社会经济生活所有方面都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学说。效用价值论自创立之后,就是西方经济学分析经济问题的基本依据,西方学者都是从效用价值论角度分析经济问题的。所以,理解了效用价值论,就不难把握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和分歧所在。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能够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研究中,冲破“两张皮”的误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三个代表”的要求,改革和重建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使“中国经济学”能够反映先进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和规律,直面现实,回答改革和开放中面临的难点和重点问题。

三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改革已经成就了举世公认的丰功伟绩:

当年那个城市衰败、农村偏枯、封闭落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中国已经完全改变了面貌。二十多年来，我们国家经济欣欣向荣，在工农业增长速度、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都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由此推测，未来朝气蓬勃、方兴未艾的中国经济能够在下世纪初提前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第三步战略设想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另一方面，中国又面对着无数长期困扰着我们的矛盾和问题：企业效率低下，城乡失业人口众多，市场无序，社会失范，腐败丛生，生态破坏，危及我们的基本生存环境。这些矛盾和问题盘根错节，恰如“一筐螃蟹”，互相纠缠，难解难分。我们虽然作出过种种努力，力图加以解决，却至今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东亚金融风波汹涌而来的时候，我们既能凭借二十年改革所造就的经济实力，特别是 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宏观经济方面取得的新成就，成功地顶住了危机的冲击，但与此同时，也使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十数个月的萧条，现在也还不能肯定地说我们已经脱离了“通货紧缩”(deflation)的漩涡。

如此这般极端矛盾却又相克共生的现象天天都在我们的面前发生，迫使我们正视它们，与它们共存。这种情况，使我们常常想起狄更斯在《双城记》一开头描绘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革命时代的名句：“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其实，这种两极共生的矛盾现象在历史大变革时期存在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在新旧更迭的时刻，新生事物总是显得不那么强大和完善，而陈旧的那一方却会凭借先占的优势负隅顽抗，不肯自动退让。而且，在这方生未死之间的新旧潮流的冲突激荡中，还免不

了有种种沉渣泛起、以假乱真的表演。然而，不管有多少艰难曲折，新制度终将战胜旧制度而确立。因此，如果由于存在着上述矛盾现象就真的认为改革的前途渺茫，得出悲观的结论，那就完全错了。从根本上说，我们的前景是乐观的。正像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的大革命虽然伴随着种种矛盾冲突、混乱甚至严重损害社会公正的行为，它终究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新时代一样，历史也终将证明，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好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主、文明、富强的国家。这种信心，不是来自简单的逻辑推论或者历史对比，而是基于过去二十年的实际业绩。这些业绩证明，当人们作出了顺乎民心、合乎潮流的历史选择，他们的努力将能够创造什么样的人间奇迹！

怎样才能通过转轨时期艰难曲折的历程到达光辉灿烂的目标？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仍将是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的切实努力。现在改革已经进入了如此深入的阶段，在新的改革阶段中，扶正祛邪，兴利除弊，一砖一瓦地建设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同时把经济改革的已有成就扩展到其他领域，进行社会政治文化的相应改革，较之意识形态的抽象辩驳和进行改革的一般号召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对于当前关系改革全局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这一重大课题来说，虽然意识形态的辩论还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下去，但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原则规定以后，重点显然已经转移到一些更加实际的问题上来。这些问题包括：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现代企业制度所讲的“四句话”应当怎样落实，以什么形式落实；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怎样才能在我国企业中确立，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与激励制度应当怎样建立；国有经济改组和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调整所依托的资本市场以及保证这个市场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功能单位——各类金融组织的发育如何加快；江泽民总书记提

出的“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的要求如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得到体现;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经济学家殚精竭虑,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并和具有改革思维的政治家、正在大量涌现的企业家们一起,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目录

第一章 导论与制度分析

第一节 “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与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经验	2
(一)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中不同主体的角色定位及其转换	2
(二)中央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制度创新	4
(三)单项制度创新的案例分析	5
第二节 阐释中国制度创新的两种理论模型 ...	7
(一)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	7
(二)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的冲突和协调	10
第三节 制度变迁的效率评价	18
(一)同意一致性程度	19
(二)制度变迁、博弈与制度创新	20
(三)制度变迁中的过渡经济学	22

第二章 制度变迁中的企业组织

第一节 企业制度改革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26
--------------------------	----

第二节 公有制企业的性质	28
(一)概念和问题	28
(二)公有制企业的产权基础	31
(三)无法消灭的事实上的个人产权	32
(四)替代性制度安排:国家租金激励.....	35
第三节 国有企业的职能定位与规模定位	40
(一)国有企业的职能定位	40
(二)国有企业的规模定位	42
第四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民营企业	45
(一)李一栗一张模型的一个非技术性概括	48
(二)对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解释	51
(三)结论	57

第三章 市场制度创新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经济理论进展	59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	59
(二)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与进展	61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65
(一)现有生产力概念的内在矛盾	65
(二)生产要素、生产关系、生产力	66
(三)生产力:判断生产关系先进与否的唯一标准.....	69
第三节 社会主义公有与私有	71
(一)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	71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	72

(三)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进一步探讨	75
(四)结论	77
第四节 市场制度创新中的法律关系	79
(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是一场深刻的法制改革	79
(二)确立新的社会主义市场	82
(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解决的理论问题	86
(四)应当建立健全哪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制度	91
(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施制度	98

第四章 宏观经济的均衡与非均衡

第一节 均衡与非均衡	102
(一)古典均衡概念与均衡理论	102
(二)30 年代以来的均衡与非均衡概念	104
(三)制度均衡、非均衡与制度变革	108
第二节 经济非均衡与体制创新	120
(一)经济体制的均衡与非均衡	120
(二)体制创新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123
(三)体制创新的过程模型	124
(四)创新成本的构成、最小化与合理分布	128
(五)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若干问题	131
第三节 宏观非均衡、制度变迁与改革战略选择	134
(一)制度变迁与改革战略	134
(二)改革的约束条件	135
(三)改革的战略选择	141

第五章 收入分配瓶颈——劳动价值论的困境与出路

第一节 认识和发展劳动价值论	148
(一)如何认识和发展劳动价值论	148
(二)在实践中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153
(三)“挑战”劳动价值论的新课题	157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劳动价值论的丰富和发展	165
(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165
(二)当代实际生活需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166
(三)脑力劳动生产非物质产品、提供服务,也创造价值	167
(四)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是“同志”、“战友”	168
(五)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	168
(六)改革开放坚持了社会主义性质	169

第六章 社会保障与福利经济学

第一节 福利经济学基础理论及其演变	171
(一)福利经济学基础理论	172
(二)基础理论的困境	174
(三)福利经济学的演变与发展	177
第二节 福利经济学中的平等与效率	182
(一)传统福利经济学中的平等和效率问题	182
(二)平等和正义理论	184
(三)最优征税理论	188
(四)相互依赖的效用函数	191
第三节 社会保障的福利经济分析——以医疗保	

险与养老金为例	194
(一) 医疗保健的公平与效率分析	194
(二) 养老金的福利经济分析	202

第七章 评判社会制度的阿基米德支点

第一节 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的两种解释的比较	215
(一) 对社会制度起源和本质的两种解释	215
(二) 理论与历史	223
第二节 论制度的均衡与演化	230
第三节 中国制度创新的改革程序设定	237
(一) 改革目标动态化:市场化取向	238
(二) 改革选择集弹性化:诱导性激励	241
(三) 制度交易关系及其类型:不完全合同	247

后 记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新时代的产物	252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生产社会化的内在要求	255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新的实现形式	257